

導言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是二十世紀最具爭議的思想家之一。他曾參與納粹政權而被控訴為「第三帝國的桂冠法學家」（Kronjurist des Dritten Reiches）。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施米特先後被蘇聯軍隊和美國軍隊逮捕，在獄中度過一年多的時間，後又送至紐倫堡審判，卻最終未被起訴。他失去了在大學的教席，獲釋後就一直隱居故鄉普萊滕堡（Plettenberg）小鎮，在那裏潛心著書，度過了孤獨卻依舊豐盛的近半個世紀，直至一九八五年以九十五歲高齡去世。雖然經歷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尤其因納粹污點而廣受非議，施米特依舊被視為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其思想持續產生影響力，仰慕者和敵對者亦不勝枚舉。近年來，圍繞施米特的討論從法學、政治學轉移到了更為廣闊的一系列思想領域，例如神學和文學。他的許多核心概念，如敵友區分、大空間政治等也在德國以外的各個國家引起了「施米特熱」，其中就包括中國，近來一些知識分子甚至欲將他重新推向神壇。他的重要原著及二手研究資料都已被譯成中文，近年來關於他的中文研究也層出不窮。

施米特之所以在中國有巨大的現實性，正是因為在這片土地上也同樣發生着宏大而複雜的現代化巨變。現代化在全球範圍內顯然已是不可逆轉的普遍邏輯，然而在中國，這種轉變尤其複雜。它並未以西方式的自由民

主為前進的目標，卻也採用了倡導現代科學技術、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等發展模式。在經濟急速發展階段，雖然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了，但中國內部因不平等所引發的問題卻層出不窮。暴發戶式的富裕群體中不乏驕奢淫逸之流，而廣大底層勞動者在艱辛的工作中也難以抵抗強烈的物慾追求，大部分人都在不顧一切地拋棄所有宗教信仰（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和人文觀念，並以絕對的主觀主義取而代之，認為這樣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塑造自己的世界。同時，不公正的惡性競爭又讓有些年輕人索性放棄對未來的期望，要不在低俗的娛樂文化中任己沉淪，要不在無欲無求的道路上愈走愈遠。這在當今中國都是普遍的趨勢。於是，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已經成為從官方到民間，從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都關心的緊迫問題。因此，施米特關於極權與民主、國家利益與個人自由、憲法的穩定性等一系列問題的獨特思考，在中國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他在一個世紀前對現代技術、對純經濟思想佔統領地位而導致的「無精神時代」的批判，在今天的中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關於施米特及其現代化批判的研究對中國現實的確意義非凡。

施米特的思想曾一度與他的納粹惡名過於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導致學術界很難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與分析。但在他去世後，世界範圍內又重新掀起一陣對他的癡迷。近年來其作品的再版以及數不勝數的各種研究資料證明，這種癡迷至今仍未熄滅。作為政治學家、法學家和哲學家的施米特已得到廣泛討論，自從邁耶（Heinrich Meier）將施米特首先定義為一個「政治神學家」後，相關研究也開始聚焦到他的神學思想。而近年

來的相關研究都表明，施米特一直通過文學批評間接表述思想，影射自己的處境，因此他的文學批評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可惜的是，儘管在豐厚的施米特研究中常常涉及他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內容，但至今為止還沒有專著系統性研究他的文學批評與其思想之間的關係。

施米特從青年時代開始就表現出對文學與藝術的廣泛興趣。他評論的對象並不局限於德語作家如歌德、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荷爾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尤其是兩位至今依舊鮮為人知的詩人多伯勒 (Theodor Däubler) 和魏斯 (Konrad Weiß)，他還深入探討過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 等世界級文學家，甚至涉獵毛澤東的詩詞。以其政治神學思想為出發點，施米特的文學批評不僅呈現了詩與宗教之間的關係，還進一步呈現了詩與政治之間的複雜性。因此，從詩學角度研究施米特作為文學批評家的角色，不僅會為詩學本身，也會為政治學、神學領域的施米特研究開啟一個有意義的視野。

本書首先聚焦施米特的兩本文學批評專著——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多伯勒的〈北極光〉——三論作品的基礎、精神與現實性》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 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時代侵入戲劇》 (*Hamlet oder Hekuba.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在此之後，本書將從施米特的所有作品中梳理出一條文學批評的紅線：以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政治的浪漫派》 (*Politische Romantik*) 中圍繞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展開的批評為起點，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

「政治神學」抑或「神學政治」？

別關注的梅爾維爾，再到戰後被他認定為最後戰友的詩人魏斯，以及他一生持續關注，卻故意隱匿在作品中的「宗教大法官」形象。這條紅線向我們逐漸鋪展出這樣的進路：施米特在一波三折的風雨人生中，從通過文學尋找精神的出發點，到通過文學進行自我定位與自我闡釋，最終卻悲哀地淪為通過文學進行自我辯解。

COPYRIGHT@2022 ISCS

第一章

施米特思想的隱秘詩學源頭 ——施米特與多伯勒：思想家與詩人的精神對話

在法國，當紀德被問至誰是最偉大的詩人時，他給出的著名回答是：「維克多·雨果，烏拉！」在德國，沒有人會理解我如此作答：「最偉大的現代詩人是泰奧多·多伯勒，烏拉！」¹

這是施米特在一九四九年的札記中對多伯勒的一段極盡讚美之詞。然而，在阿爾布萊希特 (Günter Albrecht) 一九六一年編寫的經典文學史《德國古今作家詞典》 (*Deutsches Schriftstellerlexiko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中甚至完全沒有提及這位詩人。我們不禁要問：多伯勒 (Theodor Däubler) 究竟何許人也？

一、多伯勒生平

多伯勒一八七六年出生於亞德里亞海邊 (Adriatic Sea) 的港口城市特里亞斯特 (Triest)，此地當時隸屬奧匈帝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被歸入意大利。雖然特里亞斯特在地理上屬於南歐，其語言和文化卻明顯具有中歐特色，是斯拉夫、日耳曼與拉丁文化的交匯處。

1. Carl Schmitt, *Glossarium. 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1951* (ed. 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p. 257.

多伯勒的父親是施瓦本（Schwaben）人，移民到特里亞斯特後成為當地的咖啡進口商，多伯勒的母親是西里西亞（Silesia）人，曾是一名歌唱家，婚後全心投入家庭生活。雖然出生富裕家庭，多伯勒卻從青年時代就開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一八九八年父親生意失敗後，多伯勒隨全家遷往奧地利首府維也納，隨後又如同一個流浪的波希米亞人般到處停留，遊歷意大利、德國、法國、希臘、埃及，浪跡天涯卻無處為家。尤其是少年時期在威尼斯的一次康復療養對多伯勒影響深遠，內向的他在那裏結交朋友，探索威尼斯的運河與小巷。他後來稱這段時光是他「肉體並且主要是在夢境中的」性成熟期。二十二歲時，他沒有任何前奏式作品就開始創作代表作《北極光》（*Das Nordlicht*），整整寫了十二年。一九一〇年，這部由超過三萬句詩行組成的龐大史詩以三卷本形式出版，該版本被稱為「佛羅倫薩版」。此後，多伯勒又在此基礎上修改《北極光》，即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兩卷本「日內瓦版」。

無論漂泊到何方，多伯勒都生活在藝術家圈子裏。作為詩人的他尤其對現代藝術頗富鑒賞力，在未來派、表現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家中都很受歡迎，與當時不少畫家、作家、音樂家交往甚密，如畢加索、巴拉赫（Ernst Barlach）、格萊希曼（Otto Gleichmann）等。但是，大家予以更多關注的似乎是他獨特的人格魅力與豐富的個人生活，而非他的作品。「佛羅倫薩版」的《北極光》只印了不到一千冊，出版後雖然也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團體中獲得了小範圍認可，卻從未被一般讀者認真嚴肅地對待過，此後的「日內瓦版」更是無人問津。大部分人只想滿足他們對這個怪人的好奇心，卻不明白

他創作的這部幾乎沒有情節的冗長作品到底表達了甚麼。多伯勒如此描述自己作為詩人在德國的處境：「我多多少少或許被當作一個有趣的現代詩人，但人們並不關心《北極光》。他們不想知道，真正的我是誰。」²

多伯勒在一九二六年因病重而移居德國。一九三四年，五十七歲的他死於肺結核。不幸的是，雖然他生前是德國表現主義最具影響力的開拓者與代表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該流派的重新發現，也並未替他贏來死後遲來的名聲。同樣，那部被施米特稱為「巨型軟體動物」的《北極光》至今依舊鮮有讀者。而今天德語文學和思想界對多伯勒的關注，則主要歸功於包括施米特、范·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在內的保守主義革命思想家對他的長期推崇和介紹。³

COPYRIGHT@2022 ISCS 二、施米特與多伯勒的交往

雖然多伯勒在遊歷歐洲各國時經歷了動盪的歷史，卻從未在作品中直接論述時局，從未寫過與歷史事件有關的作品，甚至從未公開就政治問題表態。然而，這個如此不具政治性的詩人卻對施米特的政治思想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以致如果想深入研究施米特的生平與作品，就無法迴避多伯勒。兩人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對施米特的世界觀意義重大。施米特甚至認為，如果海德格爾是

2. 見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多伯勒致蘇斯曼（Toni Sussmann）的信，收藏於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的多伯勒檔案室。

3. 《北極光》一出版，范·登·布魯克就於一九〇九年在柏林的日報上發表了書評。一九一一年，他在當時的前衛藝術與文學評論雜誌《燃燒者》（Der Brenner）上發表關於《北極光》的評論文章。十年後，他又在《德國評論》（Deutsche Rundschau）上發表〈多伯勒與北極光的思想〉（Theodor Däubler und die Idee des Nordlichtes）一文，將《北極光》置於保守主義文化批評視域內。

與多伯勒而不是與荷爾德林的精神相遇，那麼多伯勒就會成為德國最偉大的語言哲學家。⁴對施米特而言，多伯勒是少數真正的詩人之一，他與荷爾德林一樣，讓詩人背負起讚頌者與中介者的角色，用詩啟示了西方的命運。尤其是《北極光》，施米特稱它是「取之不竭、可以陪伴終身的」作品。⁵的確，多伯勒的詩歌陪伴了施米特近一個世紀的漫長生命，並在施米特最黑暗的歲月裏給他帶來安慰。

從施米特早年寫給他姐姐的信以及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五年間的日記中可以發現，青年時代的他是個充滿激情的閱讀者，而且很早就表現出作為一名優秀文學批評家所應具備的深入且獨特的審美素養，尤其是對現代藝術的敏銳感受力。一九一二年，施米特與他的猶太朋友艾斯勒（Franz Eisler）出版了以《剪影》（*Schattenrisse*）為題的諷刺文集，⁶在十二篇剪影式短文中對當時的娛樂文學冷嘲熱諷之餘，還嚴厲批判了一九〇〇年間自然主義文學及其代表人物，從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到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從德默爾（Richard

4. 參考 Ernst Hüsmert, “Die letzten Jahre von Carl Schmitt”, in Piet Tommisen (ed.), *Eclectica, Jg. 17, Nr. 71-72, Schmittiana I*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8), pp. 40-54，此處引自頁 46。

不過，施米特之所以持這種觀點，或許也與他和海德格爾一直保持距離有關。施米特後來也將魏斯與荷爾德林相比較，並稱魏斯的作品比荷爾德林的作品更重要。

5. 見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施米特致莫勒（Armin Mohler）的信，載 Carl Schmitt, *Carl Schmitt -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eds. Armin Mohler, Irmgard Huhn & Piet Tommis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p. 231。

6. 施米特與艾斯勒以共同的筆名 Dr. Johannes Negelinusmox，於一九一三年發表了這部作品。維琳格（Ineborg Villinger）在《施米特的現代性文化批評》（*Carl Schmitts Kulturkritik der Moderne*）一書中對施米特的這部早期作品進行了評述與分析。

Dehmel) 到托馬斯·曼 (Thomas Mann)。也正是此時，兩人開始關注起多伯勒的作品。

施米特於一九一二年初在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結識多伯勒。在一封給他姐姐奧古斯特 (Auguste Schmitt) 的信中，施米特這樣描述他對多伯勒的第一印象：「他身高近兩米，很胖，長長的黑鬍鬚，總是邊說話邊大幅度做手勢。他頭髮很長，穿得很差，在杜塞爾多夫顯得很不體面。他在克魯克森家的時候，⁷有人問起這位可怕的客人是誰，克魯克森回答說是一位基輔的大公。」⁸同年夏天，施米特與多伯勒、艾斯勒、寇曼 (Albert Kollmann)⁹一同徒步穿越萊茵州漫遊至阿爾薩斯 (Elsass)，這使施米特對多伯勒其人其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¹⁰於是到一九一六年，二十八歲的施米特發表了藝術評論專著《多伯勒的〈北極光〉——三論作品的基礎、精神與現實性》 (*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這本專著顯示出施米特卓越的文體魅力，《剪影》中嚴厲的

7. 克魯克森 (Franz Joseph Friedrich Kluxen, 1888-1968)，是施米特在文理中學時的同學，直到一九六八年去世一直都是施米特的朋友。克魯克森熱衷現代藝術，對施米特的影響不容小覷。施米特正是通過他和艾斯勒才結識了多伯勒。施米特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札記中說，克魯克森「啟發了我進入德國十九世紀充滿天才氣質的精神世界，啟發我進入瓦格納 (Richard Wagner) 和魏寧格 (Otto Weininger) 的世界」。見 Schmitt, *Glossarium*, p. 151。

關於克魯克森的生平，還可參考 Carl Schmitt *Tagebücher Oktober 1912 bis Februar 1915*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pp. 403-404。

8. 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施米特致姐姐奧古斯特的信，載 Carl Schmitt, *Jugendbriefe. Briefschaften an seine Schwester Auguste 1905-1913*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pp. 127-128。

9. 寇曼是蒙克 (Edvard Munch) 畫作的收藏者與發現者。

10. 此處可參考里采爾 (Thomas Rietzschel) 撰寫的《多伯勒的生平拼貼畫》 (*Theodor Däubler. Eine Collage seiner Biographie* [Leipzig: Reclam Verlag, 1988], p. 385)。有趣的是，這竟然是這本在東德出版的多伯勒傳記中唯一一處提到施米特名字的地方。

論戰家此刻化身為一名激情四溢的衛士，為這位在他看來被不公正地忽視的偉大詩人朋友極力辯護。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年間，施米特和多伯勒頻繁通信，¹¹施米特對於漂泊多年的詩人來說猶如一處港灣：「能再次聽到您的消息於我是一種安全感，因為我是徹底孤獨的。」¹²多伯勒於一九二六年病重回到柏林後，兩人更是經常互訪。同年年底，施米特還在呼籲建立「多伯勒社團」的申請書上簽字。多伯勒在寫給施米特的書信中則多次表達了對這種認可的感謝。「知道您曾經打開並閱讀我寫的書，對於我是極大的安慰。」¹³「您是《北極光》為數極少的朋友之一，您給了我力量。」¹⁴的確，施米特不僅是為數不多真正熟悉並崇敬多伯勒的人之一，也主動承擔起為詩人贏得聲譽的任務。自一九一〇年起，他就異常努力地推介多伯勒的作品，此後畢生都在極力讓社會認識到這位詩人的重要性，並為世人對《北極光》所表現出的「愚蠢的無所謂」倍感沮喪。¹⁵甚至在半個世紀後的一九七三年，施米特在給韋澤爾（Hansjörg Viesel）¹⁶的一封信中仍一如既往地這麼寫道：

-
11. 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立檔案館（Nordrhein-Westfälischen Hauptstaatsarchiv）的施米特檔案室裏，保存着多伯勒寫給施米特的十七封信和明信片。
12. 見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檔案編號：RW 265-431, Nr. 6）。
13. 見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檔案編號：RW 265-431, Nr. 10）。
14. 見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檔案編號：RW 265-431, Nr. 14）。
15. 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米特致莫勒的信，載 Schmitt, *Carl Schmitt -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p. 42。
16. 韋澤爾是柏林的一名舊書商，施米特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七年間曾與他保持通信。